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

下册

郑张尚芳 著

b	p	ɰ	ɒ	b	p	m	f
ɓ	ɓ̥	ɣ	ɔ	d	t	n	l
k	k̥	ɟ	ɤ	g	k	ŋ	h
k̥	ɣ		ɤ	j	q		x
h	ɣ		n	z	c		s
h	ɣ		m	ʒh	ch		sh

l	u	w		i	u	ü
c	o	ɔ		a	e	o
a	ɔ	u	ɔ	ai	ei	ao
ɣ	ɣ	ɣ	ɣ	an	en	in
g	ɣ	ɣ	ɣ	ang	eng	ing

中华书局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

下 册

郑张尚芳 著

中华书局

中古三等专有声母非组、章组、 日喻邪等母的来源*

中古各组声母中有一部分只在三等出现，等的分配极不均匀，其所以有这样的限制的原因应在来源上作出说明。这些三等专有声母中，除了群母是因其一、二、四等部分并入匣母而造成失伴状态外，还有非组、章组、日喻邪等声母有待说明。

首先得说明一下三等跟其他各等的区别，旧说它带有*ɿ*或*j*介音，这是不太准确的。三等字上古除章系（含日母）、邪母字和昔麻_三海_三齐_三等少数异常韵的声母带有后垫的*j*外，一般三等韵原来都没有介音，只发短元音，相对于一、二、四等的长元音（郑张尚芳1987.1995）。越语、泰语中的古汉语借词表明，三等韵最初只有低元音的鱼阳元严等韵开始带上*ɯ*介音，然后才扩及其他韵。例如从越语“许 *hwa*、驴 *lwa*、香 *hwaŋ*、却 *khwək*、园 *vwaŋ*、剑 *gwaŋm*、劫 *kwəp*”系列看，鱼韵字还是*wa*，离上古鱼部为*a*元音还不远，可以代表介音发生初期的情况。从*ɯ*到*i*，必然经过*ɨ*的阶段，这跟日本学者从六朝至唐的日本汉字音研究上认为《切韵》有*ɨ*[*i*]介音正相一致。设三等介音为*ɨ*，就可以说：中古后期韵图分等所根据的是各韵母介音发音部位的前后，由后而前：一等*ɔ*、二等*ɤ*、三等*ɨ*、四等*i*。从来源分析，其中*ɤ*来自上古声母后垫音*r*，*i*来自上古主元音*i*、*e*分裂。而三等*ɨ*来自短元音前增生的过渡音（郑张尚芳1996）。

* 原刊《语言研究》2003年第2期。

一 非组声母

中古三等 *i* 介音有两个变体：在前元音之前，它被前化为 *i*，在唇音和圆唇舌根音之后则被唇化为 *u*。三等前元音韵的介音既为变体 *i*，则 *i* 介音只限于央后元音韵，因此只有在央后元音前唇音才可出现变体 *u*，轻唇变化正限于这一范围，和 *u* 介音有关。旧说轻唇音来自重唇的三等合口，但既把三等的介音定为很前的 *j* 或 *i*，它们对声母的作用只能是腭化从而对唇齿化不利；今又已知《切韵》唇音不分开合，其韵母本不会有合口介音。所以旧说假设的 *i+u* 这一条件跟事实相矛盾，是说不通的。

但现在方言 *pf* 组声母的出现又的确都和后接 *u* 元音有关，不管关中、山西、安徽还是山东，*tʂ* 类声母的 *pf* 化都是由后接 *u* 引起的。张盛裕指出潮阳 *p*、*ph*、*b*、*m* 逢合口呼有人读成 *pf*、*pfh*、*bv*、*ɲ*。怎么解释唇音本无合口介音而轻唇化又应跟合口相关这一矛盾呢？我们认为用 *i* 唇化为 *u* 才可以解释。温州老派话及南边的瑞安、文成话这个元音很常见（文成还可作介音，如：半 *puə*），而且温州、瑞安作主元音时常发成唇齿性的 *vu*。*p* 组声母跟它结合时读 *puu*。如果长期融合，就有可能为向 *pf* 转化创造条件。可以设想非组是由帮组带上介音 *u* 变成的：*pi>pu>puu>pf*。据张维佳，关中 *pf* 类声母除了知庄章组外还可在帮组出现：在长武、扶风、眉县、岐山、麟游、千阳、陇县等地，“布卜堡 *pfu*、铺孵抱 *pfhu*”其韵母都已从 *u* 改成齿唇 *v*，“破 *pfho*”在长武、扶风及麟游、千阳、陇县实际读 *pfhuo*，“磨”多数地方仍为 *mo*，但长武、岐山也已是 *ɲuo*，说明其中 *v* 成分很关键。敷母字“孵”读 *pfhu* 更像是中古轻唇化开始阶段的再现。

在唐代，非重组的唇音三等韵的介音大概已变成类似的音，于是 *puu*、*phu*、*bvu*、*mu* 进一步就容易变为非 *pf*、敷 *phf*、奉 *bv*、微 *ɲ* 了，汉越语“烦 *buon*、帆 *buom*、房 *buong*、万 *muon*”中的 *u* 也许是 *v* 的反映。王尧对 823 年《唐蕃会盟碑》的藏文转写非常细致，

把很多别人忽略的下附小阿 ɦ (他利用空置字母 v 来写) 都标写出来。观其分布, 除表示全浊母后流 ɦ , 表二等、重三介音 y 外, 便是表止摄精组央化元音 i/u 跟轻唇声母后的 u 介音了。“夫 pu pvu phvu 、文 bvun 、武 bu bvu ” 是其例。敦煌藏文对音《阿弥陀经》“方网往” 同注 fibwang , 其中 w 也可能是 uɦ 的反映。至敦煌天城梵书《金刚经》则“非付发法方福, 凡佛饭奉伏” 已用 hv 、“味无闻万妄” 已用 v 表示 (张清常), 那就跟八思巴字如出一辙, 应该反映轻唇化完成阶段的情况了。

微母 m 实际是 mv 的变式, 到宋代因其鼻音成分趋于消亡而口音化了, 就留下半元音 v 以至于今。邵雍《声音图》帮组“卜步普旁” 分四母而非组“夫父” 只分二母, 所以宋初该组已完全是擦音 f 类, 而非 pf 类了。此时微母应是读 v 而与奉母读 $\text{v}[\text{fv} \sim \text{fɦ}]$ 相对立。因为 v 是次浊, 所以它可以跟鼻流音声母同样分清浊 (实际是紧松) 两套, 在温州南部方言至今仍然跟邵雍一样, 带有紧喉 ʔ 尾的上声字声母也读紧的 ʔm 、 ʔl 、 ʔj 、 ʔv , 非上声字则读松的 m 、 l 、 j 、 v 并加浊流 ɦ (发气噪音)。宋初情形应跟此一样。

二 章组声母

上古没有元音性介音, 只有复声母的后垫成分: j 、 w 、 r 、 l 。章组声母都是从上古带有后垫音 j 的各个声母来的, 当然中古只能出现于三等。其中最多的是 tj 类, 其次是 kj 类再加少量 pj 类。约在上古后期的汉代, j 的腭化作用使 kj 、 pj 都混同于 $\text{tj}[\text{tʃ}]$, 又一起变成中古章 tʃ 系。见 k 系、精 ts 组是在后接 i 、 y 的影响下腭化为现代汉语的 tʃ 组的, 这段历史距今还不太久。相对于这次较新的演化来说, 河野六郎提出: 在上古与中古之间, 牙喉音在 i 介音前已经有过第一次腭化。董同龢曾为此构拟 c 组、李方桂也曾为此构拟 krj 组, 其实它就是最早的 kj (可包括一部分 klj , 但不会有李拟的 krj , 因为如有抗腭化的 r 介入, 像在脂真韵的重组三等字一样, 就不可能出现腭

化了)。只因在他们的系统里 *j* 跟三等介音无别，不能区分那些在三等介音仍读见系不变的字，只好做这般安排。在我们的新说里，三等上古是无介音的短元音，中古带 *i*，都没有带 *j*，两者绝对不会相混。

后垫 *j* 形成章系是遍及各个韵部各个元音的，此外，上古以 *i* 为主元音的脂真质等部也对声母有腭化作用。这些短 *i* 元音至中古因前增介音而变成 *ii*，这个 *ii* 也能把见组字腭化为章组，如：指甄 **ki*>*tɕ*、嗜臣 **gi*>*dʒ*、尸身 *hi*>*ɕ*。这样才使得绝大部分以 *ii* 甚至 *ie* 为元音的重纽四等韵见组字很少，跟重纽三等不成比例；还留在见系不变的多为重纽三等字（重纽三等上古带 *r*，中古带 *y-i* 介音，故不会发生腭化）。有些重四字梵译带 *r*，如“吉诃”，说明汉代本是重三，韵图列入重四或为后来的讹变音。这类讹变曾有过记载，《颜氏家训·音辞》说“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表明支韵见系重四有重三讹变来的字。

而在这个元音前，上古 **hlji* 中所含的 *lj* 也会像邪母那样由 *lj* 变 *zj*（过程详下文），从而使 *hlji* 经过 *hzi* 变为 *si*（比较“四”错那门巴 *pli*—藏文 *bzɿ*—夏河 *hzə*—拉萨 *ɕi*），所以才有：四 **hljis*、咽 **hris* 同源，“信” *hljin*、“伸” **hlin* 通假。

三 日 母

日母主要由上古 **nj*，也包括 **ɲj*（如“儿”）、**mj*（如“柔”）来的，先变成 *n[nj]*，在中古前期的《切韵》还如此（李荣《切韵音系》。自晋至初唐玄奘都对译梵文 *ɳ*），到中古中期的唐代由于 *j* 加强而变成如高本汉所拟的 *nz*（771 年不空以后用娘对 *n*，而用日母兼译 *n*、*dʒ*）。后来 *n* 在娘母推链影响下鼻音减弱而向 *ɮ* 转变，所以到中古后期的韵图时代，它就由 *ɮʒ* 转成一种舌叶边擦音 *ɮʒ*，以此，韵图把它跟来母一起列入了半舌半齿类。

所以这样构拟，是因为：

（1）在演变上日母始终跟章组同步，是章组的鼻音声母，应一

起合成章系，在唐代藏文对音中它都作 ʒ ，跟章组作 tʃ 一致。到韵图时代章庄合为一个照组，这照组从后来的八思巴字和谚文字母看，都应是 tʃ （章组从 tʃ 变到明清的 tʃ 也该经过 tʃ 阶段），日母则被转写为 ʒ ，所以韵图时代日母部位也应该已近于 ʒ 。

（2）虽然当时藏文对音日母作 ʒ ，说明它跟浊擦音 ʒ 很相近似，但又始终保持次浊的身份，跟全浊的禅船保持距离。当时全浊声母中的浊擦音类的表现跟浊塞音不同，藏文对音已先行出现清化现象，匣作 h ，禅船作 ʃ ，邪作 s （大概像现在南吴语中的丽水等地一样，读 hfi 、 ʃʒ 、 sz ）。禅船在藏文对音主要作清化 ʃ 偶有作 ʒ 的，而日母始终作浊音 ʒ 而没有清化迹象，说明它不是浊擦音类，在稍后邵雍图中紧松二分也跟明泥来等次浊母一样，后来的声调变化两者也相一致。因此应该含有次浊类的鼻音或流音成分，即鼻擦音 nʒ 或边擦音 ɭʒ 。在今山西平遥、文水还有鼻擦音 nz ，如平遥“软 nzuaŋ 、女 nzɥ ”；金有景说从语音实验看，现在北京日母实际是准边擦音 lʒ ，而历史上曾经过 $\text{nʒ} > \text{lʒ}$ 阶段。既然 lʒ 是从 nʒ 变来的，其中的边音成分应该是腭边音 ɭ 。韵图既然跟边音来母同列一组，又说是半齿音，说明当时已是边擦音 ɭʒ 。这个音可解释北方话中日母有 j 、 l 、 ɕ 、 z 等不同变化。

（3）陆志韦《古音说略》把庄组拟音从高本汉的 ts 改为 tʃ ，因为 tʃ 组带有噤口势，故易使阳韵开口的庄组字后代变成合口。这说法可从今衢州话证明。这个方言庄知章三组都可读 tʃ 组，并且让许多古开口字都带上一个弱 ɥ 介音：庄 tʃɥā 、床 ʒɥā 、张章 tʃɥæ 、迟 dʒɥ 、缠 dʒɥē 、蛇 ʒɥa 、热 ʒɥəʔ 、人 ʒɥəŋ 、身深声 ʃɥəŋ 、双 ʃɥā 、石 ʒɥəʔ 、直 dʒɥəʔ 。这种情形只见于市区，不见于乡间，这跟杭州相似。类似的音在其他吴语并不多见，而杭州有近似的，如：庄 tsɥaŋ 、床 dzɥaŋ 、蛇 dzɥei 、热 zɥəʔ 、双 sɥaŋ 。可以推想这些与周围吴语有别的特殊语音是宋室南渡时汴洛移民语音的遗存。可佐证当时雅语音系的 tʃ 组的确带有噤口势，而促使“庄创状床霜”等字从开口变成了合口。上列这些字中有日母的“热人”等字。这种宋代移

民形成的浙江官话影响不小，现在苍南有明初所建金乡卫，城堡内的官兵后裔至今还说跟周围土话不能通话的浙江官话，其口语跟其北边大片乡镇所说蛮话中文读“人仁任”都作跟“巡”同音的 $zyoŋ$ ，使周围说温州吴语的人很觉奇怪，现在知道“人”文读作 $zyŋ$ 还见于宁波、宁海、丽水、遂昌等地，是从衢州 $zyəŋ$ （镇海 $zyəŋ$ ）这类浙江官音变来的，就可理解了。这些读法表明宋代日母部位还近于舌叶音 $ʒ$ ，而杭州儿尾 l 发达，又不像周围吴语（如余杭）那样说成鼻音 n 而说成边音，在吴语区显得北方味特重，这也是汴洛移民语音的遗存，这两个特点一结合，就显出是 $ʌ_3$ 来了。受浙江官话影响重的建德话文读自成一套，日母文读今分 l （人润若）、 j （染让）、 $s < z$ （日），说 l 说 j 都不少，这正是 $ʌ_3$ 的特征。山东淄博、章丘“二日”同读 li ，这是“儿耳二”还没跟“日”分家阶段的反映，它反映的也只能是 $ʌ_3i$ 来源。到后来 $ʌ_3$ 再转化为 $ɮ$ 为 $ɮ$ ，止摄字转化为 $ʂ$ ，就跟 l 合不到一块了。

四 以母（喻_四）

中古韵图来日合为一类，同属边音一类，后来日母却向类似 r 的通音 $ɮ$ 转化了。旧说来母上古中古都是边音 l 。根据新的研究，来母上古是 $*r$ ，而喻_四上古才是 $*l$ ，这两种声母都是流音一类，闽语白读都有变成 s 的。布依语方言有 $r > z > s$ 的变化，可以解释闽北的“老螺”读 s 现象，东汉三国梵汉对音已经有喻_四“耶翼盐夷育”对 $ɕ$ 、 s 的了，俞敏解释是对其浊化音 $ʒ$ 。今福鼎的“痒” $sioŋ^6$ 在有浊音的浙南闽东方言苍南蛮话里还说 $ʒið^6$ （江山、开化吴语说 $ʒið^4$ ），这可以解释闽南闽北的“翼盐檐蝇”读 s 现象。这个 $ʒ$ 是 $ʌ$ 的反映。西汉译 Alexandria 为“乌弋山离”时，喻_四的“弋”对 lek ，东汉则同音的“翼”已对译 $ʌ$ 了。这显示 $l > ʌ$ 的腭面化方向，为后来 $> j$ 而成为中古喻_四（以母）提供了条件。喻_四作上古以母时本来不限于三等，《后汉书·西羌传》“羌人谓奴为无弋”，相当藏文 $milag$ （仆人）的古译，

其中的“弋”对 lag, 四等的“易”对泰文“lɛɛk 交换”也是洪音;“谷”《广韵》有古禄、卢谷、余蜀三切, 上古音分别是 :kloog、roog、loog, 龙州壮语的 luuk (山谷) 就是对余蜀一切的。只是后世 l>j 后多使用转注法另写作“峪”, 但《唐蕃会盟碑》的“将军谷”的“谷”的对音就作 jog。

五 邪母和云母(喻_三)

分析诸声系统可知, 邪母来源也跟喻母有关。开口字来自喻_四以母, 合口字来自喻_三云母。

在 l>ɿ>j 之际, ɿ 本来接近 ʒ, 带有后垫音 j 的 lɿ>ɿj 则更容易变 ʒj 变 zj, 最后成为中古的邪母。因为它来自带 j 的声母, 当然只有三等。又因为它在来源上跟精组不一样(这从诸声系统上跟精组无关可以证明), 所以不像精组还可在一、四等出现(精组二等则因带 r 而变成庄组)。据最新研究, 中古精组是从上古的 sl 精, sh、shl 清, z、zl 从, s、sl 心来的, 而庄组是从 sr' 庄、shr 初、zr 崇、sr 生来的。

邪母合口字老和喉音字关联, 或是喻母, 或是匣母, “穗”跟“惠”、“旬”跟“匀”, 声符相同, 它们都来自上古的 sGw。

喻_三来自上古小舌音 *Gw (潘悟云)。上古 *G 的一、二、四等至中古也和群母一样混入匣母, 故只三等 Gw 入喻; 但在 iɪ 和 iE 前又腭化变为 jwɪ、jwɪE, 从而混入喻_四, 不过从诸声上仍能辨认其来源, 以“匀”跟“筠均”、“颖”跟“顷倾”、“惟”跟“睢”比, 可见原来本应归 Gw, 至汉代变成 fɪw。因为“惟”是 fɪwɪ, 所以梵汉对音以之对 vi。

参考文献

河野六郎 1950 《中国语音韵史研究一方向》,《中国文化研究会会报》第2期(1)

- 金有景 1984 《论日母》，《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潘悟云 1997 《喉音考》，《民族语文》第5期
- 王 尧 1982 《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
- 俞 敏 1999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张清常 1963 《唐五代西北方音一项参考材料——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张盛裕 1981 《潮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第1期
- 张维佳 1999 《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
- 郑张尚芳 1987 《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院学报》第4期
- 1995 《上古汉语声母系统》ICCL-4/NACCL-7 论文，威斯康辛大学
- 1996 《汉语介音的来源分析》，《语言研究》增刊
- 1999 《汉语塞擦音声母的来源》，《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古音的分期与拟音问题*

中古音自高本汉作出拟音以来，虽然大框架已定，但不管在系统上或细节上，学界都已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主要的有王力、陆志韦、董同龢、李荣、邵荣芬、马丁、蒲立本、周法高、李方桂、李新魁等家。有的意见极相对立，如纯四等有无 i- 介音，王力、周法高、李方桂等沿袭高氏之说带有 i- 介音，陆志韦、李荣、蒲立本、邵荣芬等则力证其无。其他歧见也不在少数。

有些歧见实际上可以互补而非绝对排斥的，这牵涉到《切韵》的性质与中古音的分期问题。中古音常以《切韵》作代表而又被视为兼赅唐音，这就有问题。《切韵》实际是隋初学者对南北朝以来形成的南北两派读书音的折中（金陵雅音是洛下雅音的南迁变体，所以它是对同一种雅音内部两派读音的折中审选，其对象并不包括受鄙视的土著方音），以此它并不代表唐代读音。而以三十六字母及四等列图的等韵图体系则属于中唐以后至五代音系的归纳。后者可以从敦煌的吐蕃文献藏文对音和唐代科举音读教育所形成的汉越语得到印证。

我们可以观察从上古到中古、中古到近代的音韵演变规律显示的音规（或音变链），审查各种过渡音值是否合理，并以藏文对音、汉越语读音、其他域外对音及唐代梵译印证拟音的合理性。

既然《切韵》和韵图分别代表不同并有重大差异的时代，它们就可表示相承而非排斥的关系。端组帮组是到等韵图才完成向舌上、轻唇的分化的，庄组章组在韵图里才合流为照组，日母到韵图才脱

* 原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汉语音韵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2000。

离鼻音，从鼻擦音向接近来母（所谓半舌半齿）的边擦音转化。这都跟二、三等所具介音相关，那么《切韵》的介音系统自应是观察的重点。

从比汉越语更早的越语古借词看，纯四等韵是从无介音发展出 *i-* 介音的，越文中借词有两个层次：一般通用的汉越语反映唐音，而古汉越语反映汉至六朝音，前者除齐韵外往往已有 *i-*，而后者却没有，如：茧 *ken⁵—kien³* | 莲 *sen¹ (<ren)* — *lien¹* | 炼 *ren²—luyen⁶* | 添 *them¹—thiem¹* | 殿 *den²—dien⁶* | 边 *ben¹—bien¹* | 叫 *keu¹—kieu⁵* | 节 *tet⁵—tiet⁵* | 结 *ket⁵—kiet⁵*

泰文也有一批四等韵不带 *i-* 的早期借词或同源词（下列泰文词是用音标转写泰文字母，原调符 1 转写作 -h，常对汉语去声；调符 2 转写为 -x，常对汉语上声，无调符字常对汉语平声，但不严格），如：坚 *keen^h* 硬 | 兼 *keem* 夹杂 | 猥 *keen^h* 敏捷 | 胫 *kheen^x* 小腿 | 肩 *kheen* 臂膊 | 蒹 *kheem* 芦苇 | 悬 *khween* 悬吊 | 县 *gwween^x* 区、城 | 舷 *geen* 舷、边 | 嫌 *geem^x* 愤恨 | 甸 *?deen* 疆土 | 添 *theem* | 錠 *deen^h* | 片 *pheen^h* | 螟 *meeen* 飞虫 | 了 *leeux* 完了 | 星 *seeng* 亮光 | 镊 *hneeb* 镊子 | 芍 *heux* 胡了切 荸荠 | 燕 *?een^h* 燕子

那么可以相信《切韵》纯四等韵原来没有介音，到韵图时代则出现 *i-*，大家知道，*e<ie<ia* 是一种很常见的音变链。在唐后期五代的藏文对音中，四等字已发展到 *ia* 阶段，如《唐蕃会盟碑》的“兼 *kjam*：检 *kem*”已经可以说明，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列千字文对音“条谦千田坚眠”等字都以 *ja* 为主元音也足以说明。这个 *ie/ia* 既然是从 *e* 裂化而来的，其中的 *i-* 自然是元音性的。

三等 *ɪ* 介音也是后起的，上古三等韵只是短元音而没有介音。早期梵汉对译中，梵文没介音的单纯元音如“*u* 优、*ug* 郁、*kap* 劫、*ko* 拘”还常用三等字来对。在古越语的汉语借词（王力称古汉越语）中三等字一般是没有介音的。除了少数几个在 *e<ie<ia* 音变链的字外，遇鱼阳严元等几个古低元音韵和尤韵则出现 *u* 介音，如：许 *hwa*、驴 *lua*、却 *khwaek*、香 *hwaŋ*、秧 *waŋ*、剑 *gwaem*、劫 *kwap*、腌 *waɐ*、园 *vuən*、优 *wu*、有 *huu*。在泰文和武鸣壮语的古借词中也有类似

表现，尤其在鱼阳韵。从纯元音的喉音到前腭介音 i ，那 iu 可能是中间最合适的过渡阶段，比如从 u 到 iu 就应该经过 $u > iu > iu > iu$ 的音变历程。从少数韵带 iu - 发展到所有短元音韵带 iu ，要有一个过程。从日本学者的日朝汉字对音研究所得，《切韵》时代三等介音是 i ，此音大致相当于上面音变链中的 i ，这很合适。这一中腭介音容易出现变体，在前高元音之前，它较早地向 i 变化，为重组韵的分化创造条件；在唇音之后，它易变为 i 的圆唇音 u ，为轻唇音的产生创造条件。

二等旧说无介音，只是元音是次洪的 a 、 æ ，所以后来形成见系腭化。但这不能解释江韵元音被拟为比东韵更开的 ɔ ，反而在独成一摄时还要列在二等而不能列一等，也不能解释 ɔ 干吗以后同样也要腭化。如果说那是韵图时代它已变得近 a 了，干吗不列入宕摄二等去，而却要一韵自成一摄。唐神珙反纽图上端的《五音声论》所列喉舌齿唇牙五声中以见系一等字“何我刚鄂歌可康各”作“喉声”例字，而以见系二等字“更硬牙格行幸亨客”作“牙声”的例字。见-和见-的声母区别在这位音韵学者眼里竟然达到分别喉牙的地步。可见二等声母必然带有明显的牙音化成分，那应该是一个后腭介音 $y[\text{ɥ}]$ 。在唐五代吐蕃文献的藏文注音中二等字有的无介音，有的却带 j 或 w 。如：邈 $m\text{jag}$ 、fibjag，间 $k\text{jen}$ ，幻 $h\text{jan}$ ，解 $k\text{we}$ ，眼 $fig\text{wan}$ 、 $fig\text{jen}$ 。今佻佬语带后腭介音 y 的复声母在各地就有 $y[\text{ɥ}]$ 、 j 、 w 三种变化。而这些带 $y[\text{ɥ}]$ 的复声母，如“山 $p\text{ya}$ 、蛋 $k\text{y}\text{əi}$ ”在一些古老的同语族语言（如已消亡的阿含语）是带 r 、 l 的复声母，这跟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拟二等字带有 r 音正好相合。

等韵门法把有独立二等韵的摄特别分为外转，外转八摄也特别用二等字“江蟹臻山效假咸梗”来标名，为什么这样特别重视二等，就是因为二等有特殊的来自复声母的带 y 声母。它们因其独立的特征总被列为同一个等里，即使这个摄只有一个韵如江韵，也不例外。

在 1983 年北京大学开的上古音讨论会上，俞敏和郑张尚芳都主张不仅二等带 r ，重组三等也带 r ，现在海内外持这一主张的学者已

经很多了。那么到中古重组三等也应带 y ，以此跟重组四等相区别。王尧对《唐蕃会盟碑》的藏文转写比罗常培先生精细得多，其中所标小阿 fi （王氏利用空置字母 v 写）除对云母和浊声母后流气化音外，还用来标 y 介音（二等：绛 $kfiag$ 、三等重组：俛 $fibiēn$ 、检 $kfiem$ 、议 $figfi$ ）。这种介音 y 在对音中有所表现是很难得的。

因此我们认为《切韵》只有 y 、 i 两种介音，但 i 已有 i 、 u 两个变体。韵图的四等则全按介音前后排列，从后而前：一等 0、二等后腭 y 、三等中腭 i 、四等前腭 i 。

中古音的范围是从六朝到五代，前面的晋代是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后面的宋代是中古到近代的过渡期（或可称近古），也带有中古音的特点，是中古之边缘范围。特点是以歌麻二韵分布占据低元音 a 的位置（不同于上古用模鱼麻、近代用麻₂），并出现元音性介音及音位性声调。中古音本身也应分三期：前期六朝至初唐，以《切韵》为代表；中期为唐，以《慧琳音义》等为代表；后期为晚唐五代，以《韵镜》为代表。

声母方面，《切韵》唇音不分开合，可是又说轻唇化的条件是唇音合口三等，未免矛盾，尤其旧说把三等的介音定为很前的 j 或 $ɿ$ ，它们对声母的作用只能是腭化而不是唇齿化，我们把三等介音改为 i ，认为在唇音声母的影响下，它会圆唇化为 u 。这个音在温州老派和南边的瑞安话里都很常见，常常发成齿唇的 vu 。在唐代非重组的唇音三等韵的介音已变成类似的音，于是 puu 、 phu 、 mu 进一步就容易变为非 pf 、敷 phf 、奉 bv 、微 m 了。《唐蕃会盟碑》“夫文武”等字声母后常加小阿 fi ，可能是 u 介音的反映。汉越语“烦 $buon$ 、帆 $buom$ 、房 $buong$ 、万 $muon$ ”中的 u 也许就是 v 的反映。

知庄组来自上古后期带 r 的端 tr 组和精组 tsr （前期为 sr' 、 shr 、 zr ），中古 $-r$ 变为 $-y$ ，受后腭介音的影响， t 和 ts 组声母也后化为知庄两组，可能是舌面化为 $tʃ$ 和 $tʃʰ$ 组（但可有舌后变体 t 和 $tʂ$ ，就和孙宏开所记的福贡怒语一样）。而且在 $u-i$ 介音前，端组三等字也同样变成知组。在韵图时代庄 $tʃ$ 章 $tʃʰ$ 又合一为照组，《蒙古字韵》则

知照再合为 tʃ, 依《四声通考》谚文材料看, 照组变 tʃ 之后, 知组还读 tʃ 组。则在照知 tʃ 化之前都像是经过向 tʃ 集中的阶段。设想章组 tɕ 变 tʃ 之前有一 tʃ 阶段也比较合理。如果依高本汉庄组一开始就是 tʃ, 庄章合流为照的基础只能为 tʃ, 这和吐蕃时期藏文对音庄章知都写作 tɕ 组的情况不合, tɕ 和 tʃ 相差过大, tɕ 跟 tʃ 则比较相近。

依诸声关系, 禅母应跟端组同类, 原来来自 dj, 应拟为塞擦音 dz, 依梵汉对译也是如此。船母则与书以母同类, 应拟擦音 ʒ。韵图颠倒是后期禅船相混以后的事。

日母来自上古的 nj 及 ŋi、mj, 前期是 nɳ 而逐步 nɳ 化, 中期是 nɳ 而逐步 lɳ 化, 后期是 ʎɳ 而逐步 lɳ 化, 即前面的鼻音成分减弱为边音成分, 然后转化为部位跟照组相应的边擦音。《唐蕃会盟碑》“儒孺, 绶尚”同用 ʒ 母对音, 自然不是全同, 却显示它跟 ʒ 已极相似, 照韵图跟来母同列半舌半齿音及清浊(次浊)来看, 应拟为边擦音, 而不是浊擦音, 否则就要归全浊了(金有景《论日母》,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84)。

中古音喉牙有别, 影晓匣喻既称喉音, 自当分别拟为 ʔ、h、ɦ、ʌ, 但喻母是在韵图时代才合一的, 《切韵》还分云 ɦ、以 j。前期云可说是匣的细音部分, 吐蕃藏文对音中匣母常对 h(大概实际是清音浊流 hɦ)而云母作 fw, 分化明显。

韵母方面应在主元音上设置 ʌ、i、u 等音位。中古的哈灰覃韵来自上古 w、u 元音(旧说作 ə), 它们到中古低化了, 但也不能就达到 a、A 的程度, 应拟为比 a 稍高的 ʌ。江韵来自上古带 r 的 o、u 元音, 中古也低化了并且向 a 靠近, 它也应拟为 yʌ, 这个 y 介音对江韵后来部分念 iaŋ、部分念 uaŋ, 可以作出较好解释。鱼韵来自上古的 a, 古汉越语作 wa, 中古向虞韵 io 靠拢, 但韵图列开口, 应是 o 的展唇音 rɤ(平山久雄考论作 iɔ), 晚期则向 iu 发展。从 wa 到 iɤ, 应经过 iʌ, 因此应为鱼韵拟出前期 iʌ—中期 iɤ—晚期 iu 的音变链。

登蒸韵上古只是蒸部的长短元音, 但六朝已分化成不相协押的两个韵母。旧说都拟作 ə 元音, 这就不能说明它们为何不相协韵。

我们认为受阻元音变化比开放元音慢，因此当登韵从 u 低化为 a 时，带 i 介音的蒸韵元音还是 iu ，然后因两音非常近似，就合并作 i （之韵也一样），登 $aŋ$ 、蒸 $iŋ$ 元音差异大，所以不相协韵。相似的还有痕魂 $aŋ$ 不同于殷 $iŋ$ 。注意从唐代蕃汉对音，应把文韵拟为 iun 。而微韵拟为 ii ，这是个带 i 介音的 i ，所以它入止摄而不入蟹摄。

侯韵来自上古 o ，至蕃汉对音已为 $e'u[əu]$ ，从 o 到 $əu$ 自然经过 u 阶段，大概开始是个 $əu$ ，韵图才是完全开口的 $əu$ 。东韵在韵图也有作开口的，大概后期也有变 $əu$ 的阶段，现在浙江龙泉东韵就读 $əuŋ$ 。

我们把二等韵都加上 y ，佳耕咸山皆为 $yε$ ，庚为 $yæ$ 而麻衔删夬肴为 ya （但麻_三为 ia ）。

重组韵都来自上古 i 、 e 元音，中古脂真侵幽四等为 $iɪ$ （原 i 元音因带上 i 介音而开化），三等为 $yɪɪ$ ，后期则变 $ɪɪ$ （幽韵唇音只有三等，喉牙只有四等）。支清盐仙祭宵四等 $iε$ （原 e 元音因加介音 i 而开化）三等为 $yɪε$ ，后期则变 $ɪε$ 。这样重组三、四等一直保持区别。这类 $y-i$ 在八思巴字中及《中原音韵》中还有反映，重三的“彼披皮笔密”等带 u 介音，就像后者的二等“包饱豹”带 u 介音而不同于一等“褒宝报”一样，那 u 介音都是从 y 转化来的。

一般三等韵都改 i 介音，元音依旧。但阳韵应依越文跟“严元废”韵一样改为 ie 元音。

《蒙古字韵》所代表的音系及 八思巴字一些转写问题*

汉语是历史悠久、文献丰富的语言。可是因汉字本身不具体标音，所以研究汉语史又有着别的有文献语言所没有的困难。其中最叫人烦恼的是怎样具体标写出各个时代的音。既然缺乏当时的标音材料，就只能不甚可靠地拟音，一家一个样，聚讼难定。虽然上古晚期已有梵汉对译，中古有藏汉对译等，但那都是不系统的对译，同一汉字可能有多个对译形式（参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音虽然对中古音研究有帮助，但那都是为当地有了变化的汉字传统读法标音，并非为汉语标音。

汉语史上具体记录当时语音，有系统地逐一给汉字依当时汉语读法标音的书，首推元代以八思巴字母标音的《蒙古字韵》，然后是明代以谚文字母标音的《四声通考》《四声通解》，以拉丁字母标音的《西儒耳目资》。要研究近代官话形成史，非研究透这几本书不可。又因为它们虽用拼音字母标写，但这些字母并非科学的音标，就得将它们先用音标标出其实际音值，即有一个将字母转写为音标的问题。那么，首先碰到的是八思巴字的转写问题。要解决转写所存在的一些难点，还先要了解它标写的音系是代表什么话的音系。下面分四节就七个疑难点予以讨论，提出拙见以求教同行，并纪念李新魁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

* 原刊《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8。